

研究生导学关系的系统性重构

付恒阳

陕西理工大学人文学院, 陕西 汉中

收稿日期: 2026年4月24日; 录用日期: 2026年7月2日; 发布日期: 2026年7月10日

摘要

当前, 研究生教育导学关系普遍存在重科研轻育人、关系异化以及德育功能虚化等问题, 这些问题已成为研究生教育高质量发展的瓶颈。文章通过梳理现有导学关系研究的成果与不足, 从价值基石、角色内涵、互动内容、关系模式四个维度展开系统性重构分析: 在价值理念上, 实现从“制器”范式工具理性向“育人”范式价值理性的转变; 在导师角色上, 完成从专注学术的“经师”到兼具学业、人生、道德引领的“人师”的升级; 在互动内容上, 从单一“学术域”拓展为融合学术、价值、生活的“成长域”; 在关系模式上, 由单向度“权威-服从”模式重构为双向互动的“学习与发展共同体”模式。同时, 构建了包含强化导师育人培训、完善多元评价激励机制、搭建常态化交流平台、营造尊师重教文化氛围的支撑体系, 为新型导学关系落地提供保障。

关键词

育人铸魂, 研究生教育, 导学关系, 重构

Systematic Restructuring of the Supervisor-Graduate Student Relationship

Hengyang Fu

School of Humanities, Shaanxi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Hanzhong Shaanxi

Received: April 24, 2026; accepted: July 2, 2026; published: July 10, 2026

Abstract

The current supervisor-student relationship in postgraduate education generally suffers from problems such as prioritizing research over character development, distorted relationships, and a weakened moral education function, becoming a bottleneck for th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postgraduate education. This paper systematically reconstructs and analyzes the shortcomings of existing research on supervisor-student relationships from four dimensions: value foundation, role connotation, interaction content, and relationship model. In terms of value concepts, it aims to achieve a shift from the instrumental rationality of the “tool-making” paradigm to the value rationality of the “character-cultivating” paradigm. In terms of the mentor’s role, it aims to upgrade from a “master of knowledge” focused solely on academics to a “mentor of character” who provides guidance in academics, life, and morality. In terms of interaction content, it aims to expand from a single “academic domain” to a “growth domain” integrating academics, values, and life. In terms of the relationship model, it aims to reconstruct the one-dimensional “authority-obedience” model into a two-way interactive “learning and development community” model. Simultaneously, this paper constructs a support system that includes strengthening mentor training, improving diversified evaluation and incentive mechanisms, establishing a regular communication platform, and creating a culture of respect for teachers and education, providing a guarantee for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new supervisor-student relationship.

Keywords

Cultivating Virtue and Nurturing Talents, Postgraduate Educati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upervisor and Student, Reconstruction

Copyright © 2026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4.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Open Access

1. 引言

当前，研究生导师与研究生之间的导学关系正面临严峻的挑战与深刻的异化[1]。传统“传道、授业、解惑”的师生伦理在科研绩效压力与功利主义取向的冲击下逐渐式微，其应然的教育性、发展性本质被严重削弱。实践中，“老板-员工”式的异化关系屡见不鲜，导学互动被简化为项目发包与成果产出，情感疏离与沟通不畅成为普遍现象[2]。导师的角色趋于单一化，过度聚焦于“学业指导”与“科研训练”，而“重科研轻育人”的倾向导致其对研究生的思想引导、价值塑造与人生规划的“育人”职责被边缘化，导学关系的德育功能陷入虚化，这不仅影响了研究生的全面成长与身心健康，也成为制约研究生教育高质量发展的核心瓶颈。

在此背景下，国家明确提出将“育人铸魂”作为教育的根本任务，这对如今研究生教育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标志着其价值导向正从“制器”向“育人”转型。研究生导学关系作为实现育人铸魂目标的最前沿、最核心、最关键的环节，其质量直接关系到“培养什么人、怎样培养人、为谁培养人”这一根本问题的解答。原有的仅以学术传承为纽带的工具性关系模式已无法承载“育人铸魂”所蕴含的全面发展的丰富内涵。因此，推动导学关系从单一维度的“学业指导”向全方位“人生引路”转型升级，构建融学术培养、价值引领与人格塑造于一体的新型导学共同体[3]，已成为一项迫切而重大的时代命题与实践需求。

导学关系作为研究生培养过程中的核心纽带，历来是高等教育研究领域的焦点议题。国内外学者对导学关系的研究已形成了较为丰富的成果，主要集中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是影响因素研究。大量研究致力于剖析影响导学关系质量的关键因素。这些因素可归纳为制度层面、导师层面、学生层面及环境层面[4]。制度层面，研究生教育评价体系“唯论文、唯项目”的功利化倾向被普遍认为是导致导学关系异化、导师“重科研轻育人”的重要根源[5]。导师层面，其指导风格、师德师风、学术能力以及沟通意愿被视为构建和谐导学关系的主导因素[6]。学生层面，Z世代研究生个性化的成长需求、学术兴趣及主动性也

日益受到关注[7]。环境层面,高校的管理制度、文化氛围以及扩招带来的师生比变化,均对导学关系构成深远影响[8]。二是模式类型研究。为理解导学关系的多样性,学者们尝试对其进行模式划分。早期研究多基于权力距离和互动频率,区分出“权威型”、“放任型”、“民主型”等模式[9][10]。近期研究则引入了更丰富的理论视角,如契约关系(强调权利、义务与平等)[11]、共生关系(强调互惠互利、共同进化)[12]以及共同体关系(强调学术、价值与情感的共同体属性)[13]。这些研究认识到,理想的导学关系应超越传统的“师徒”或“老板-员工”模式,向更平等、更互动、更全面的“良师益友”型或“学习科研共同体”模式演进[14][15]。三是沟通与优化策略研究。针对导学关系中存在的沟通不畅、矛盾冲突等问题,众多研究提出了微观和宏观的优化策略。微观上,倡导建立常态化对话机制、加强导师的沟通技巧培训、提升学生的主动沟通能力等[16][17]。宏观上,呼吁改革导师评价机制,将育人成效纳入核心考核指标[18][19];构建协同育人体系,明确高校、院系、家庭等多元主体的责任,形成育人合力[20];探索“导学育人”等新工作模式,将思想政治工作融入导学互动全过程[21]。

尽管现有研究提供了多维度的洞见,然而,当置于“育人铸魂”这一我国教育根本任务的视域下审视时,仍存在以下不足:一是系统性“重构”分析的缺失。现有研究虽普遍认同“育人铸魂”的重要性,并常将其作为背景或政策依据。但多数研究仍倾向于在既有的导学关系框架内进行“优化”或“改良”,从根本上审视“育人铸魂”根本任务并系统重构导学关系的内在本质、核心价值与实践形态的研究尚显不足。“育人铸魂”并非简单附加项,它要求对导学关系的价值基点、角色期待、互动内容和关系模式进行一场深刻的范式革命,即从工具性的“学业指导”转向生成性的“人生引路”。现有研究对此“重构”过程的理论深度、系统性和彻底性探讨仍有欠缺。二是“破”与“立”的结合不够紧密。大量研究敏锐地指出了当前导学关系的“异化”问题,但对于如何“立”,即如何构建一个正面、积极、符合“育人铸魂”要求的新型“导学共同体”模型,其理论构建和实践路径的描绘仍不够清晰和丰满。

基于上述分析,本研究明确提出“重构”视角,将“育人铸魂”根本任务不再视为外部变量,而是作为驱动导学关系发生范式转型的内生性核心动力,进行系统性、整体性的理论分析。同时,试图超越对现象的策略性应对,深入剖析“学业指导”与“人生引路”两种范式背后的价值哲学差异,并从理念、角色、内容、模式四个相互关联的维度,构建一个解释“重构”过程的理论分析框架,深化对“导学共同体”内涵的理解。

2. 导学关系价值理念转型

2.1. 传统理念：“制器”范式下的学业指导

在传统的导学关系范式下,其核心理念呈现出显著的“制器”特征[22],即倾向于将研究生培养视为一种标准化、工具化的生产过程。在这一范式下,价值取向突出表现为效率至上、知识传递与技能培训。导师往往以科研项目和学术产出的效率为首要追求,指导过程侧重于对既有知识的单向传递与实验操作、论文写作等实用技能的快速培训[23],而在此过程中,学生无形中被定位为完成科研任务的“工具”或“劳动力”,其作为独立个体的全面成长需求与主体性价值易遭到忽视。与之相应,这种范式下的核心目标变得极为明确且局限——一切围绕“产出学术成果”与“保障学生顺利毕业”这两个可量化、易考核的指标展开。这种目标设定虽在短期内保障了科研产出与培养流程的效率,却在根本上窄化了研究生教育的丰富内涵,削弱了其本应承担的“育人”使命,使得导学关系在某种程度上陷入一种功利化、工具化的异化状态。

2.2. 育人铸魂理念：“育人”范式下的人生引路

与之截然相反,在“育人铸魂”根本任务的指引下,导学关系得以超越“制器”的狭隘框架,迈向一

种以“育人”为核心、以“人生引路”为崇高使命的新范式。这一范式的价值取向发生了根本性转变，其核心是以生为本、全面发展、品德为先[24]。它要求导师将学生不再视为达成科研目标的工具，而是看作一个具有独立人格、丰富情感和无限潜能的、可塑且完整的“人”。指导的焦点从单纯的学术效率转向学生的整体性成长，强调在知识传授之外，更应关注其思想品德、科学精神、人文素养、心理健康和社会责任感的综合培育，从而实现德育与才育的深度融合。与此相应，其目标也得以升华和拓展，从追求短期、具象的学术成果，转向塑造德才兼备的高层次创新人才。这一目标不仅关注学生能否成为合格的学者，更关乎其是否具有全球视野、创新精神和健全人格，最终使导学关系的实践回归教育的本质，即对人的全面发展的成全。

上述两种理念的对比，其根本差异与深刻重构体现在哲学基础的根本性转向上，即导学关系的价值基点从“工具理性”主导转向“价值理性”主导。“制器”范式下的学业指导，其内核是典型的工具理性，它强调通过计算、效率和可控的手段(如项目、论文)来达成外在的、功利的特定目标(如毕业、发表)，人和关系本身在此过程中被降格为实现目标的工具与手段。而“育人”范式下的人生引路，其内核则是价值理性，它基于对“育人铸魂”这一终极价值信念的自觉信仰与遵循，强调行为本身的自足价值(如人的全面发展、品德的完善)，并以此价值来选择和规定行动的方向，人及其发展成为了最终的目的。正是这一价值基点的深刻转换，驱动了导学关系在角色、内容与模式等各个层面的系统性重构，最终使得教育的终极目的得以真正回归到“人”的全面发展之上。

3. 导学关系实践路径重构

3.1. 导师角色内涵的重构

3.1.1. 传统角色：“经师”

“经师”角色源自传统的师徒传承模式，其核心职能高度聚焦于学生的学术领域，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首先，作为知识权威，导师是特定学科领域内高深知识的掌控者和传授者，其主要职责在于系统性地向学生传递专业知识、研究方法和前沿动态，确保学术薪火得以相传。其次，作为科研领路人，导师负责将学生引入学术研究的殿堂，通过确定研究方向、审定研究方案、解答学术疑难、把关研究成果质量，引领学生逐步掌握独立从事科学研究的能力。最后，在日益项目化的科研环境中，导师常常扮演项目管理者角色，负责筹措科研经费、组织科研团队、分配研究任务、管理项目进程，并在此过程中评估学生的科研贡献。

然而，这一传统角色存在其固有的角色局限。其职能边界基本局限于学术领域，而对学生的思想、道德、品性和人生价值追求等考虑不多[25]，与学生的情感世界、道德养成以及人生长远发展的联结相对较弱。导师的关注点首要且压倒性地集中于学生的学术产出与科研进度，衡量成功标准也简化为论文发表、项目结题等可量化的学术指标。在这种角色定位下，师生间的互动内容趋于单一化和功能化，导师往往无意也无力深入关切学生的思想困惑、价值选择、职业迷茫或心理健康等问题。这导致“育人”工作中最为核心的“立德”维度在一定程度上被悬置，使得导学关系成为一种虽高效但“半身瘫痪”的、缺乏情感温度和人格感召力的工具性关系，无法完全回应学生作为“完整的个体”的全面发展需求。

3.1.2. 重构后的角色：“人师”

在“育人铸魂”根本任务的指引下，研究生导师的角色内涵经历了深刻的重构，从其传统的“经师”定位，迈向一个更为完整和崇高的“人师”理想型。这一重构后的角色，其核心职能不再局限于学术范畴，而是要求导师成为学业导师、人生导师与道德楷模的三重统一体。这意味着导师的职责是立体且多维的，既要传授“谋事之才”，更要传授“立世之德”，实现对研究生“才”的锻造与“人”的培育的有

机统一。

为实现这一核心职能，导师的角色实现了前所未有的拓展，具体体现在四个关键维度：

学术创新的激发者。这是“人师”角色的学术根基。它超越了单纯的知识传授与项目管理，要求导师善于激发学生的学术好奇心与内在创新动力，培养其批判性思维、勇于探索未知的能力以及坚守真理的科学精神，守护学术研究的纯粹性与崇高性。

道德品行的示范者。这是“人师”角色的价值核心。导师自身的人格魅力、学术操守、价值观念与社会责任，成为最直接、最生动的德育教材。通过言传身教，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恪守学术规范，培养严谨求实的学风和诚信正直的品格。

生涯规划的指引者。导师的关注点从学生的“毕业”延伸至其整个“职业生涯”乃至“人生发展”。他们应基于对学生的深入了解，为其提供职业选择、能力储备、发展路径等方面的宝贵建议与资源支持，帮助学生在广阔的社会图景中找到自身定位，实现人生价值。

心理健康的守护者。面对科研压力与成长困惑，导师需给予学生更多的人文关怀与情感支持。通过积极沟通，及时察觉学生的心理波动与压力状态，扮演好倾听者、支持者和引导者的角色，营造一个健康、包容、积极的成长环境，促进其身心和谐发展。

此番角色拓展，标志着导师角色实现了一场从单一、扁平的学术权威，到多元、立体的教育者与引领者的根本性蜕变。它极大地丰富和深化了“研究生培养第一责任人”的意涵，强调其责任范围覆盖了学生思想、学业、身心、生涯发展的全方位与全过程，真正肩负起为国家培养优秀人才的全面职责。

3.2. 导学互动内容的重构

3.2.1. 传统内容：单一的学术域

在传统的导学关系模式下，导师与研究生之间的互动内容呈现出高度聚焦和领域集中的特征，其核心几乎完全局限于“学术域”这一单一维度[26]。双方的交流与互动主要围绕着科研活动的具体环节展开，包括课题选择的论证与确定、实验设计的方案与可行性讨论、论文撰写的修改与完善，以及数据发表的规范与期刊选择等。这些互动内容直接服务于科研项目的推进与学术成果的产出，构成了导学互动中最主要、最频繁的主题。

这种单一的内容结构呈现出三个显著的内容特点：其一是专业化。互动严格限定在特定的学科专业领域之内，讨论的是高度专门化的知识、技术和方法问题；其二是技术化。交流的重点往往集中于研究方案的技术路线、数据分析的处理技巧、论文写作的规范格式等操作性和程序性层面；其三是去情感化。互动过程强调理性、客观和效率，极少涉及双方的情感交流、价值判断或人生体验，学生的个人成长困惑、思想动态及情感需求通常被排除在正式的导学对话之外。这种高度技术化和去情感化的互动内容，虽然在一定程度上保障了科研训练的效率和专业性，但却极大地压缩了导学关系的教育内涵，使其演变为一种功能性的“科研合作”或“学术作坊”关系，背离了教育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本质追求。

3.2.2. 重构后的内容：融合的成长域

立足于“育人铸魂”的根本任务，导学互动的内涵实现了根本性的拓展与深化，从狭窄的“学术域”转向一个全方位、多层次的“融合的成长域”。这一重构后的互动内容不再仅仅围绕科研产出，而是全面覆盖研究生作为“完整的人”的发展需求，其互动涵盖以下三个相互交融的核心域。

一是学术域。在保留传统科研训练核心要素的基础上，其内涵得以升华。互动内容从技术性操作层面，上升至对学科前沿探索的引领、批判性思维训练的强化，以及对学术诚信教育的贯穿始终。它旨在培养研究生追求真理、勇于创新的学术志趣与严谨治学的扎实功底。

二是价值域。这是“立德”的关键体现，是互动内容重构的灵魂所在。导学对话主动融入对科学精

神、社会责任以及学术伦理的深入讨论。导师通过言传身教，引导研究生将个人的学术追求与国家发展、民族复兴的伟大事业相结合，树立正确的价值观与崇高的学术理想。

三是生活域。互动内容突破学术边界，关切研究生的现实生活与长远发展。它自然延伸至职业选择的探讨、人际关系的调适、科研压力疏导的支持以及身心健康的主动关怀。导师在此域中扮演着倾听者、支持者和引路人的角色，帮助学生平衡学业与生活，提升综合素养。

此番内容拓展，标志着导学互动实现了知识传授、能力培养与价值塑造的深度有机融合。三者不再是割裂的平行线，而是在每一次有价值的互动中交织在一起。学术训练承载价值引领，生活关怀蕴含人格塑造。这使得导学关系彻底摆脱了单一功能性的束缚，渗透到学生成长的全过程，真正成为了一种富有教育意蕴、充满人文关怀的全面发展型关系，为培养德才兼备的高层次人才提供了丰厚的土壤。

3.3. 导学关系模式的重构

3.3.1. 传统模式：单向度的“权威-服从”模式

在传统的导学关系实践中，长期存在着一种较为普遍且根深蒂固的模式，即单向度的“权威-服从”模式[1]。这一模式的典型特征在于其结构上的高度不对称性，导师处于主导地位，掌控着研究方向、资源分配与最终决策权。而学生则处于从属地位，主要职责是被动接受任务、执行指令并达成导师设定的目标。二者之间的沟通方式呈现出明显的垂直化、等级化特征，信息流动以上行下达为主，缺乏平等、开放的横向交流与反馈机制。这种模式虽在特定背景下有助于保证科研效率与指令传递的清晰度，但其内在的弊端亦十分突出。首先，它极大地抑制了学生的自主性与创造性思维，使其习惯于等待和依赖指令，难以培养其独立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的批判性思考能力与学术自信；其次，这种权力与地位的不平等性极易引发矛盾，学术观点上的分歧或因沟通不畅产生的误解，在等级化的框架下可能演变为隐性的对抗或显性的冲突，损害导学关系的健康与和谐，最终背离了教育“教学相长”的初衷。

3.3.2. 重构后的模式：双向互动的“学习与发展共同体”模式

为承载“人生引路”的育人使命，导学关系的模式亟需超越传统的“权威-服从”结构，重构为一种双向互动的“学习与发展共同体”模式[14]。这一新模式建立在全新的关系伦理之上，其核心特征表现为主体间性、教学相长和文化共生等特征。

主体间性是这一共同体的关系基石。它意味着师生双方不再是主导与从属的对立两极，而是作为互尊互爱的独立主体相遇。导师尊重学生的人格独立性与学术自主权，学生亦认可导师的指导地位与经验价值，二者通过坦诚、开放的对话，构建起一种基于相互承认和理解的主体间关系。

教学相长是这一共同体动态发展的核心机制。它打破了传统的单向灌输，强调师生在互动中相互滋养、共同进步。导师在指导中实现自我提升，通过倾听学生的创新想法、接触前沿视角来反思并更新自身的知识体系；学生在探索中反哺团队，其活力、新鲜见解与数字化能力成为推动团队创新的重要力量，真正实现了知识与智慧的循环增值。

文化共生是这一共同体健康运行的生态保障。师生共同致力于营造追求真理、团结协作、包容开放的团队文化。在此文化氛围中，学术争论被视为探寻真理的必要途径而非对权威的挑战，失败被理解为成长的宝贵阶梯而非能力的否定，团队成员在相互支持与协作中感受到归属感与价值感。

这一模式转型标志着导学关系模式从“控制与服从”转向“对话与共生”。它不再是一个基于权力运行的垂直结构，而是一个情感共鸣、价值共享、责任共担、成就共享的有机共同体。在此共同体中，师生的联结超越了功利性的科研合作，升华为基于共同价值追求和情感投入的深度互动，为落实“育人铸魂”根本任务提供了最坚实、最富有生命力的载体。

3.4. 导学关系重构的支撑体系

3.4.1. 强化导师育人职责与培训

系统性的重构需要坚实的制度支撑与实践保障。为推动导学关系真正实现从“学业指导”到“人生引路”的范式转型，必须构建一个多维度的支撑体系。其中，首要且关键的一环在于强化导师育人职责与培训。

当前，许多导师的指导能力，尤其在“人生引路”所需的沟通、关怀与价值引领方面，并非与生俱来，需要通过系统化的培训得以激发和提升。因此，必须健全上岗、在岗培训制度，将其作为一项基础性、常态化的制度安排。上岗培训应成为新任导师的“必修课”，不仅要涵盖科研指导规范、学位制度政策，更须重点强化其作为“第一责任人”的育人职责教育，通过案例分析、伦理研讨等方式，使其深刻理解“育人铸魂”的内涵与要求，树立“经师”与“人师”相统一的角色认同。在岗培训则应贯穿导师职业生涯始终，定期组织专题工作坊、经验交流沙龙与教学反思会，聚焦“如何与学生进行有效沟通”、“如何识别与疏导学生心理压力”、“如何将价值观引领融入科研指导”等现实议题，持续提升导师“人生引路”的意识与能力。唯有通过这种持续、深入、有针对性的培训，才能将“育人铸魂”从一种外部要求，内化为导师群体的自觉追求与卓越实践，为新型导学关系的构建提供坚实的人力资本基础。

3.4.2. 完善评价与激励机制

若要真正引导导师践行“人生引路”的职责，就必须扭转其行为背后的指挥棒，核心在于完善评价与激励机制[2]。当前高校“唯论文、唯项目、唯经费”的功利化评价体系直接强化了导学关系的工具性逻辑[27]，是导致“重科研轻育人”现象的结构性根源。因此，必须进行深刻改革，将育人成效实质性、制度化地纳入导师考核评价体系，并赋予其关键权重。这意味着，在导师的年度考核、职称评定、评优奖励中，不能仅看重其发表了哪些论文、申请到多少项目，还必须系统考察其作为“第一责任人”的履职情况。评价内容应涵盖其指导学生的全面投入与成果，例如：对学生的思想引导、学术诚信教育、心理健康关怀的频率与效果；学生在价值观塑造、社会责任感、团队协作精神等方面的成长反馈等。通过构建包含学术指导、德育成效、学生评价等多维度的多元评价指标体系，并从制度上保障其落实，才能有效扭转“唯论文、唯项目”的片面导向，从源头上激励导师愿意投入时间与情感，关注学生的长远与全面发展，最终实现评价体系对“育人铸魂”根本任务的正面牵引与坚实支撑。

3.4.3. 搭建常态化交流平台

理念的转变与角色的重构最终需依托于稳定而有效的互动载体来实现[28]，因此，搭建常态化交流平台成为支撑新型导学关系落地的关键基础设施。其核心在于突破以往随机、松散、纯学术性的互动局限，通过建立制度化的组会、谈心、团队建设机制，为师生深度交流创造结构化的时间与空间，使“人生引路”有章可循、有径可走。首先，应对传统的组会进行内涵升级，使其从单一的研究进度汇报会，转型为集学术研讨、思想碰撞、经验分享与生活关怀于一体的多元交流平台，鼓励学生在此展示全面自我，也促使导师给予多维度的反馈。其次，必须建立定期的、一对一的谈心机制，将其作为一项明确的制度性要求，而非可有可无的补充。这为导师深入了解学生的思想动态、学业困难、职业规划与心理状态提供了私密而可靠的渠道，是进行个性化、精细化“引路”的前提。最后，应定期组织形式多样的团队建设活动，如学术沙龙、读书会、户外拓展等，旨在在非正式场合淡化身份区隔，增进情感联结，培育团队归属感与共同体文化。通过这些制度化、多元化的平台设计，能够有效促进师生之间深度、坦诚、全方位的交流，将偶然、自发的互动转化为稳定、自觉的育人实践，为构建情感共鸣、教学相长的导学共同体提供持续的动力源泉。

3.4.4. 营造尊师重教的文化氛围

制度构建与平台搭建为导学关系的重构提供了“硬”支撑，而营造尊师重教的文化氛围则为其提供至关重要的“软”环境[29]。高校作为文化高地，应主动发挥其价值引领与文化塑造功能，大力宣传优秀导师典型，通过校园网站、官方媒体、颁奖典礼等多种渠道，系统性地挖掘、评选并广泛传播那些在“教书育人”、“人生引路”方面事迹突出、深受学生爱戴的导师榜样。将他们的感人故事、先进理念与成功实践作为鲜活教材，使“经师”与“人师”相统一的形象可知可感、可学可及，为全体导师树立行为标杆。与此同时，高校需有意识地弘扬和谐的导学文化，通过举办“导学关系建设月”、“良师益友”评选、导学团队风采展示等主题活动，倡导“尊师爱生、教学相长、民主平等、和谐共进”的现代导学关系理念，并将其深度融入校风、教风、学风建设之中。这种浓厚的文化氛围能够潜移默化地提升导师的职业荣誉感与育人内驱力，增强学生的感恩意识与成才动力，从而在全校范围内凝聚共识，为新型导学关系的构建与可持续发展提供深沉而持久的精神滋养和文化支撑。

4. 重构方案在现实中可能面临的挑战与对策

4.1. 现实挑战

4.1.1. 制度惯性与路径依赖

高校长期形成的科研导向管理流程、资源分配规则已固化，传统导学关系运行模式根深蒂固，新型导学关系的理念与实践难以快速融入现有制度体系，改革推进易陷入“表面化”困境。

4.1.2. 评价体系改革阻力大

“唯论文、唯项目”的评价标准已成为行业共识，职称评定、经费申请等核心环节仍以科研成果为核心依据，将育人成效纳入评价体系，会触动既有利益格局，遭遇管理部门与部分导师的抵触。

4.1.3. 导师精力分配困境

导师承担科研、教学、行政等多重任务，扩招背景下指导学生数量增多，用于学术指导的时间已被压缩，难以再投入充足精力开展价值引领、心理关怀、生涯指导等育人工作。

4.1.4. 师生期望错位冲突

部分导师仍坚守“权威型”指导模式，侧重科研产出；研究生更追求平等沟通、个性化成长支持，双方在指导方式、互动频率、成长目标上存在认知偏差，易引发矛盾。

4.1.5. 保障机制供给不足

常态化交流平台缺乏制度约束，多为自发开展；导师育人能力培训流于形式，针对性与实效性不足；校园育人文化氛围薄弱，难以形成改革合力。

4.2. 操作性应对策略

4.2.1. 渐进式破除制度惯性

采取“试点先行、逐步推广”模式，选取优势院系开展新型导学关系试点，形成可复制案例后逐步覆盖全校；修订研究生培养管理办法，将育人要求嵌入招生、培养、答辩全流程。

4.2.2. 柔性推进评价改革

建立“科研 + 育人”双轨评价体系，育人指标赋予 20%~30%权重，采用学生评价、同行评议、典型事迹佐证相结合的方式；设立育人专项奖励，与职称评定、评优评先直接挂钩，降低改革阻力。

4.2.3. 优化导师精力配置

合理限定导师指导学生数量，设立育人工作当量，抵扣科研工作量；配备助教、辅导员协同育人，分担导师日常沟通、心理疏导等事务，释放导师核心育人精力。

4.2.4. 弥合师生期望偏差

开学初开展导学双向见面会，明确双方权利义务与成长目标；建立导学沟通清单，规范定期谈心、组会交流频次；开展师生沟通技巧培训，提升双方互动质量。

4.2.5. 完善落地保障体系

将常态化交流平台纳入院系考核，要求每月至少1次综合型组会、每学期1次一对一谈心；打造“良师益友”示范团队，以典型引领营造尊师爱生、教学相长的育人文化。

5. 结论

“育人铸魂”根本任务对研究生导学关系并非浅层的调整与优化，而是一场系统性、整体性的深刻重构。这一重构过程具体体现在理念、角色、内容、模式四个相互关联的维度：在理念上，推动了导学关系的价值基点从追求效率的“工具理性”向培育新人的“价值理性”回归，确立了“育人”而非“制器”的终极目的；在角色上，促使导师角色从局限于学术传授的“经师”，向融合“学业导师、人生导师与道德楷模”于一体的“人师”转变，承担起“第一责任人”的全面职责；在内容上，引导互动范畴从狭窄的“学术域”拓展至融合“学术域、价值域与生活域”的“成长域”，实现了知识传授、能力培养与价值塑造的有机统一；在模式上，推动关系形态从垂直、单向的“权威-服从”模式，转向平等、互动的“学习与发展共同体”模式，构建了情感共鸣、责任共担、成就共享的共生机制。

经由这四个维度的协同重构，导学关系的内涵发生了从“学业指导”到“人生引路”的深刻蜕变。它超越了传统意义上以学术传承与科研训练为核心功能的工具性关系，演进为一种以学生的全面发展和价值形成为根本旨归的、更高级、更丰富、更富有教育意蕴的“导学共同体”。这一共同体不仅是知识创新的场所，更是人格塑造、精神成长和生命影响的生命场域，是落实“育人铸魂”根本任务最直接、最核心的实践载体，为培养新时期优秀研究生提供了坚实的关系保障。

基金项目

教育部规划基金项目：AI时代我国高校人文教育困境与突破路径研究(25XJA880001)；陕西理工大学研究生教育教学改革研究项目：立德树人视野下研究生导师与研究生导学关系研究(SLGYJG2513)。

参考文献

- [1] 李金林. 导学关系解困：新时代建构策略[J]. 中国高等教育, 2025(6): 57-59.
- [2] 谢俊慧, 施卫华. 高校研究生教育中导学关系研究[J]. <https://d.wanfangdata.com.cn/periodical/CihQZXJpb2RpY2FsQ0hJU29scjkyMDI2MDYxMDIwMjYwNjEw-MTYxMjM4EhJ4eGRqeXN4ankyMDI0MjQwMjcaCDhoYzdpYXFv>
- [3] 胡启明, 陈艺凤. 研究生导学关系紧张的微观权力分析与调适[J]. 黑龙江高教研究, 2026, 44(6): 85-91.
- [4] Gruzdev, I., Terentev, E. and Dzhafarova, Z. (2019) Superhero or Hands-Off Supervisor? An Empirical Categorization of PhD Supervision Styles and Student Satisfaction in Russian Universities. *Higher Education*, **79**, 773-789. <https://doi.org/10.1007/s10734-019-00437-w>
- [5] 谭鑫渊, 任少波. 德育共同体：建构导学关系的新视野[J]. 学位与研究生教育, 2021(9): 67-72.
- [6] 金蕊, 陈珏. 基于研究生视角的导学关系现状及影响因素研究[J]. 湖北第二师范学院学报, 2020, 37(6): 76-83.
- [7] 王文文, 郭宁, 王扬. 硕士研究生导学关系现状及影响因素研究[J]. 研究生教育研究, 2018(6): 76-82.

- [8] 宋成. 研究生教育中的导学关系: 影响因素与对策构建[J]. 学位与研究生教育, 2021(3): 9-14.
- [9] Bartlett, J.G., Dowell, S.F., Mandell, L.A., File, T.M., Musher, D.M. and Fine, M.J. (2000) Practice Guidelines for the Management of Community-Acquired Pneumonia in Adults. *Clinical Infectious Diseases*, **31**, 347-382. <https://doi.org/10.1086/313954>
- [10] 徐岚, 陶涛, 严弋. 师生关系的跨文化比较研究: 基于过程的博士生培养质量[J]. 学位与研究生教育, 2016(10): 62-66.
- [11] MacDonald, C. and Williams-Jones, B. (2009) Supervisor-Student Relations: Examining the Spectrum of Conflicts of Interest in Bioscience Laboratories. *Accountability in Research*, **16**, 106-126. <https://doi.org/10.1080/08989620902855033>
- [12] 樊小杰. 共生理论视角下导学共同体的价值意蕴、运行机制与推进路径[J]. 江苏高教, 2022(11): 105-108.
- [13] 张荣祥, 马君雅. 导学共同体: 构建研究生导学关系的新思路[J]. 学位与研究生教育, 2020(9): 32-36.
- [14] 胡洪武. 师生发展共同体: 破解研究生导学矛盾新路径[J]. 研究生教育研究, 2021(4): 48-52.
- [15] Hamid, N.A.A., Abd Rahman, R. and Hamidin, N.M. (2021) Nurturing Positive Atmosphere in Supervisor-Supervisee Relationship Throughout Postgraduate Studie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Advanced Research in Education and Society*, **3**, 21-33.
- [16] 牟晖, 武立勋, 徐淑贤. 和谐视域下研究生导学关系构建浅析[J]. 思想教育研究, 2014(5): 72-74.
- [17] 李礼. 社交网络视阈下研究生导学关系满意度研究[J]. 北京教育(高教), 2018(12): 27-29.
- [18] Janssen, S., van Vuuren, M. and de Jong, M.D.T. (2020) Sensemaking in Supervisor-Doctoral Student Relationships: Revealing Schemas on the Fulfillment of Basic Psychological Needs. *Studies in Higher Education*, **46**, 2738-2750. <https://doi.org/10.1080/03075079.2020.1804850>
- [19] 施鹏, 张宇. 论研究生教育中和谐师生关系及其构建路径[J]. 学位与研究生教育, 2015(5): 37-41.
- [20] 茹宗志, 刘晓敏. 当代导师与研究生关系异化的内在机理与重建思路[J]. 教学研究, 2022, 45(1): 29-35, 86.
- [21] 王佳寅. “导学思政”的内涵、核心要素与实施方略[J]. 研究生教育研究, 2021(6): 63-67.
- [22] 安强身, 柳兴国. 制器、立德与人的发展——我国高等教育人才培养理念与实践的反思[J]. 宁波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 2016, 38(4): 37-41.
- [23] 李函颖, 徐蕾. 工科师生关系会受科研项目类型的影响吗?——对高水平大学工科博士生与导师基于科研项目交往的质性考察[J]. 学位与研究生教育, 2022(4): 43-51.
- [24] 张雪蓉. 立德树人视角下研究生导师角色塑造与胜任力构建[J]. 南京邮电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5, 27(5): 107-112.
- [25] 王飞, 张升峰. 从“经师”到“人师”——育人铸魂之时代吁求[J]. 教育理论与实践, 2023, 43(16): 37-44.
- [26] 王燕华. 从工具理性走向交往理性——研究生“导学关系”探析[J]. 研究生教育研究, 2018(1): 60-66.
- [27] 杜静, 常海洋. 博士生导学关系中交往理性的缺失与回归[J]. 学位与研究生教育, 2022(4): 28-35.
- [28] 周小斌. 学科育人视角下的有效师生互动研究[J]. 教育理论与实践, 2013, 33(18): 32-34.
- [29] 刘义兵, 李月. 重塑“尊师重教”: 当代意义及其路径[J]. 当代教育科学, 2022(5): 56-62.